

后殖民理论经典译丛

逆写 帝国

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Helen Tiffin

[澳大利亚] 比尔·阿希克洛夫特 著
格瑞斯·格里菲斯
海伦·蒂芬

任一鸣 译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Second Editio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逆写 帝国

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Helen Tiffin

[澳大利亚] 比尔·阿希克洛夫特
格瑞斯·格里菲斯 著
海伦·蒂芬

任一鸣 译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Second Editio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0-273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澳)阿希克洛夫特(Ashcroft, B.), (澳)格里菲斯(Griffiths, G.), (澳)蒂芬(Tiffin, H.)著;任一鸣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6

(后殖民理论经典译丛)

ISBN 978-7-301-24266-7

I. ①逆… II. ①阿…②格…③蒂…④任…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世界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7975号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2nd Edition / by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Helen Tiffin / ISBN: 0-415-28020-6

Copyright © 2002 by Routledg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旗下Routledge出版, 并经授权翻译出版。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Taylor & Francis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 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责任者: [澳大利亚]比尔·阿希克洛夫特 格瑞斯·格里菲斯 海伦·蒂芬 著 任一鸣 译
责任编辑: 吴 敏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266-7/I · 277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s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6印张 220千字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后殖民理论经典译丛”总序

赵稀方

“后殖民”这个词国人已经耳熟能详,但真正了解这一理论的人却不多,这是我们翻译出版这一套“后殖民理论经典译丛”的原因。中国读者多数只知道萨义德的《东方学》,1999年三联出版过王宇根的译本。再深入一点,会知道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前者有一个“读本”翻译过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后者的著作则还没有译本。事实上,后殖民理论的重要人物远不止这些。第一批“后殖民理论经典译丛”的书单,并不包括上述人物的著作。这一批“译丛”包括三本书,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的《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罗伯特·扬的《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阿吉兹·阿罕默德的《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这三本书,中国读者未必熟悉,但它们毫无疑问是后殖民理论的经典著作。没读过这三本书,我们很难说对于后殖民理论有深入了解。下面,我对这三本书及其后殖民背景略做介绍,以便于读者有一个基本了解。



我们知道,1978年萨义德《东方学》一书的出版是后殖民理论的滥觞,不过萨义德的这本书只讨论了“东方主义”,并没有涉及“后殖民”。首先揭橥后殖民理论的,正是1989年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出版的《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践》一书。这本书首次将二战以来的“后殖民”一词挪用过来,讨论了后殖民的性质、位置及其与当代理论的关系等。作者阿希克洛夫特等人重新定义了后殖民的范围,认为从殖民化开始直至今天都属于后殖民时期,这个后来常常为人征引的定义完全改变了二战以来的后殖民概念。1995年,阿希克洛夫特等三人又编写的厚厚一大本《后殖民研究读本》,成为了学界后殖民理论的权威读本。1998年,这三位学者又集体编写了《后殖民研究关键词》一书,对于后殖民理论的关键概念一一予以解释确证。论著、选本、概念阐释,这三本同样由著名出版社Routledge推出的著作,完成了一种常规的理论建构过程,确立了后殖民主义理论。

不过,这三个人是从后殖民文学的角度确立后殖民理论的,与萨义德等人的角度不太一样。我们知道,萨义德的《东方学》主要分析西方历史、文学文献中的东方主义话语,没有涉及所谓的东方,斯皮瓦克则在《庶民能说话吗?》等文中断言东方无法说话,霍米·巴巴则主要强调不能说话的东方在模仿西方人过程中存在着“变形”等。总体来说,萨义德等人所展开的是话语分析,而阿希克洛夫特等人则主要研究殖民地文学挪用、反抗宗主国英文的策略和理论,这些属于反话语范畴。《逆写帝国》首次在当代理论背景下系统地讨论后殖民理论,不过,书中将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看作是当代后结构主义运用于后殖民领域的结果,而从后殖民文学的角度建构后殖民理论。文中谈到,欧洲帝国主义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层面长期维持文化统治,不过与此相伴随的是殖民地本土文化的抵抗,后殖民文学正是这种帝国文化和本土文化斗争的结果,“作为结果,‘后殖民理论’是用来描绘这个现象的,它早在这个特定的名字出现之前就存在很久了。当被殖民者开始反省和表达由帝国语言与本土经验竞争而有力的混合所带来的紧张时,后殖民‘理论’就形成了”。^①

^① Ashcroft, William D., Gareth Griffith, and Helen Tiffin,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5, p. 1.

《逆写帝国》一书的主要贡献正在于后殖民文学的创立。这本书与其说是对于萨义德《东方主义》一书的继承,毋宁说是一种补充。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仅仅梳理了西方殖民宗主国的东方主义话语,并没有涉及东方自身,《逆写帝国》则恰恰论述了殖民主义阴影下的殖民地文学。迄今为止,对于后殖民文本的论述有多种模式。一是国家或地区的模式:殖民地国独立后,多数的殖民文学以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文学形式出现,如尼日利亚文学、印度文学、澳大利亚文学等;区域性则以地域为标准,如西印度群岛文学、南太平洋文学、非洲文学等。二是两处或更多地区的文学比较模式,其中主要有三种:(1)白人侨居国家之间的比较,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文学的比较;(2)黑人侨居国家的文学比较;(3)联系这些地区的文学比较,如西印度群岛和澳大利亚文学的比较。三是“黑人写作”,这种以肤色为分类标准的文学跨越了不同的地区和社会,如美洲黑人、非洲黑人等。还有其他名称,如“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Literature),新英语文学(New Literature in English)、殖民文学(Colonial Literature)等。书中认为,这些分类模式各有局限,如以国家、地区及肤色为标准的文学容易导致国家主义及种族主义正统本质主义,“联邦文学”仅指英联邦文学,范围太窄,相反英语文学则范围太大,殖民文学则无法概括独立后的文学。作者倾向的名称是“后殖民文学”,“无论如何,‘后殖民文学’这一术语之所以最终较其他术语更好,是因为指出了一种殖民主义影响研究的途径,可应用于如非洲和印度等语境中的英语写作和本地语写作,以及其他语言(法国,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写作之中”。^①书中最后谈到了“杂交与融合”的最新模式,这种将欧洲时间拓展为空间,将被殖民者与殖民者联系起来讨论的思路,打破了从前的本质分隔的格局。“后殖民文学”虽然殖民关系为分界,但早已不再停留于从前“殖民/反抗”的二元对立模式上。

^①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First published 1989 by Routledge, p. 23.

《逆写帝国》一书首先从两方面论述了前殖民地地区“逆写帝国”的方式,一是重置语言,二是重置文本。按照法依的说法,不同的语言意味着不同的世界,因而在讨论后殖民写作的时候,首先碰到就是语言问题。不过,“逆写帝国”并不涉及地方语写作的问题,而是讨论在英语写作中地方英语对中心英语的抵抗和挪用。为区别两种英语,书里将欧洲中心英语以大写 English 来表示,而将地方英语以小写 english 来表示。前殖民地地区的语言分布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单一语言,如英语,一般发生于侨居殖民地;二是双语,如印度、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魁北克也已经建立了一个双语社会;三是多语,它主要发生在加勒比海地区。就地方英语写作而言,后殖民写作可分过两个过程:一是对于中心英语特权的背弃和否定,以此抵制在书写交流上的西方大都市的权力;二是对于中心英语的挪用和再造,这种重造意味着与殖民权力的脱离。书中提出了一些后殖民文本的挪用策略,并予以专门的分析。这里省去书中大量的文本分析例证,只简单引出方法:(1)“注解”:对个别词语的插入式注解,这是跨文化文本中最明显最常见的作者侵入手段,例如“he took him into his obi (hut)”,“介于 obi 和 hut 之间的潜在空隙,事实上质疑了这个词的公认的指涉,并建立了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 obi”。(2)“不翻译的词语”:选择忠实于原来的地方语,不加于翻译,这是一种传达文化差异的常见的技巧,“这种设计不仅能表达文化间的差异,而且也能说明文化概念翻译过程中话语的重要性”。(3)“语言混杂”:“作为交接符号的未翻译的词语的运用,似乎是一种成功的突出文化差异的手段,因此看起来更有效的,是通过融合两种语言结构从而生产一种‘跨文化’。”(4)语法融合:试图将本土语法与标准英语融合起来,从而改写语言。(5)语码转换和土语摹用:“挪用过程中最常见的嵌入变化的方式,可能两种或两种以上语码间的转换技巧,特别在加勒比连续体的文学中。多语作家的技巧使用串字法使得方言更加可及,运用双重注解和语码转换作为一种交织的翻译模式,挑选特定的文字保留于原文之中。所有这些都是在写作中安装文化差异的通常

方法。”^①

语言的挪用是后殖民写作显示文化差异的重要手段,但尚是初步手段,更为重要的挪用却是写作本身。作者将后殖民写作的特征归结为三点:一是“后殖民的声音被帝国中心所沉默和边缘化”,二是“文本中对于帝国中心的取消”,三是“对于中心文化和语言的积极挪用”。^②书中通过对于具体的作品,具体阐释了后殖民写作的不同策略。路易斯·尼科西的《配种鸟》(Lewis Nkosi, *Mating Birds*)写的是一个南非黑人由于强奸了一名白人妇女而被囚杀的故事,呈现了漠视黑人无辜(被白人妇女引诱)的殖民主义种族话语操控过程。小说刻意表现白人世界和黑人世界的不可逾越的界线,表达了“殖民主义与沉默”的主题。奈保尔的《模仿人》(V. S. Naipaul, *The Mimic Men*)同样表现了运作于殖民世界里的帝国权力关系,表现了殖民者永远的“真确性”和被殖民者的模仿位置。奈保尔矛盾地受到中心的吸引,并悲观地认为这种等级秩序是难以改变的。不过,他虽然认为边缘是虚无的,但同时也看到了作为中心的“现实”、“真理”和“秩序”的虚幻性。尼科西的《配种鸟》和奈保尔的《模仿人》这两个文本“表达了想逃避主导中心的破坏和边缘的力量的不可能性,及废弃这种状况的需要。无论是性侵害还是社会成功都无法逃避压制人物的内在毁坏力量。这两个文本证明了后殖现实的毁坏力和模仿性”。^③米歇尔·安东尼的《桑德拉大街》(Michael Anthony, *Sandra Street*)写英文老师布拉德斯与学生的故事,呈现老师所代表英语的世界与学生所代表的本土经验的冲突。在正统的英文话语里,现实的语言是被排斥的“他者”,不过学生的世界却拆散了真确性话语的权威。提摩斯·芬德勒的《旅途上的不需要》(Timothy Findley, *Not Wanted on the Voyage*)将《圣经》中诺亚洪水的拯救故

①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First published 1989 by Routledge, pp. 58-76.

② Ibid., p. 82.

③ Ibid., p. 114.

事改写成了以少数权利之名进毁灭之实的传说,小说以改写欧洲传统经典的方式,从“他者”的角度质疑了欧洲最古老的文明叙述。米歇尔·安东尼的《桑德拉大街》和蒂莫西·芬德列的《旅途上的不需要》这两个文本“发展了另外的颠覆策略,推翻约束他们的形式和主题,将他们的后殖民性的‘局限’转变成他们的形式和题材原创和力量的来源”。^①詹尼特·弗雷姆的《字母的边缘》(Janet Frame, *The Edge of The Alphabet*)写三个分别来自澳大利亚、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人在旅途中相遇,在小说的对话叙述中,中心消失了,只留下永恒的边缘。纳拉扬的小说《买糖果的小贩》(R. K. Narayan, *The Vendor of Sweets*)谈到的是一个小店员贾干与社会及传统的关系,让人瞩目的是文本对于挪用权利的尝试和坚持。《字母的边缘》和《买糖果的小贩》这两个文本,“以它们的不同的方式,形成了非常不同的社会视野,说明了消解在语言和形式上被全然接受的认识论概念的可能性。这些变成了不再构想为‘他者’而是成功地自我决定和自我维持的社会,能够在既有权力框架内重新安排概念结构”。^②

语言和文本的挪用,导致理论的论述。《逆写帝国》的第四章接着讨论后殖民地区的本土理论建构。不同类型的地区,具有不同的问题。殖民抵抗的直接反映,首先就是寻找自己的文化。印度本土文学及批评有着不亚于欧洲文化的悠久历史,让人困惑的问题是这些本土美学传统如何可以运用到现代批评上。在非洲,塞萨尔(Aime Cesaire)及森格(Leopold Senghor)等人建立起了“黑人性”(Negritude)的概念,它后来成为非洲黑人美学及黑人文学的基础。法依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讨论了文化身份的不确定性,并从传统的开放性角度论述现代民族文化,这些都得到了当今后殖民理论家的肯定。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欧洲白人侨居地区在本土理论建构上的独特问题在于,拓殖民者不但要面

①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First published 1989 by Routledge, p. 114.

② 同上。

临“旧大陆与新大陆的社会和文学实践的关系”,还要面临“殖民地上的本土居民与外来拓殖者的关系”。加勒比海地区面临复杂的现实,则发展出了不同的实践策略,书中分别从“爱德华·布拉斯维特与克里奥尔化”“邓尼斯·威廉斯和催化”“威尔逊·哈里斯与融合视野”等方面对此进行了简要讨论。

与本土理论相对,《逆写帝国》论述了后殖民经验与当代西方理论的关系,此所谓“重置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讨论了西方现代主义与后殖民的关系。书中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对现实主义的突破和现代主义尝试,源于西方和“他者”的遭遇经历。非洲文化的引进,直接启发了欧洲现代主义者,如贝宁征战带回来的非洲艺术促成了劳伦斯小说《虹》中的非洲意象,巴黎人类博物馆的收藏成为毕加索的绘画的灵感。这种启发并不止于提供灵感和材料,更在于首次以“异类”的艺术打破了欧洲中心的艺术的普遍性,使得欧洲的艺术开始质疑欧洲艺术原则的美学原则,现代主义革新于兹起步。

《逆写帝国》结论部分的题目是“小写的英语多于大写的英语”,作者在这里概括了自己对于后殖民文学的基本看法。书中谈到:当代后殖民社会的文学已经不再是欧洲模式的简单应用,而充满了互动和挪用,欧洲主导话语已经受到质疑和颠覆。对于殖民话语的质疑,很容易带来回归纯净本土的冲动,这种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可能实现,因为后殖民文学早已是一种文化杂交的现象,重构只能在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重新获得。书中提出了后殖民文学之于地方英语研究及其机制的三个结论:一、“不同的小写英语的存在意味着标准英语的概念已经破裂”;二、“随着这种去中心的进一步启示,中心英语经典在世界地方英语的新范式中被彻底减缩”;三、“后殖民文学研究表明,所有的文本都被各种复杂性所贯穿,通常的文学研究将因此得到重生”。^①

《逆写帝国》既是后殖民理论建构的第一本著作,又是后殖民文学

^①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First published 1989 by Routledge, pp. 221-222.

的首创之作,对于关注当代理论和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

《逆写帝国》出版的次年,即1990年,罗伯特·扬的《白色神话》出版。《白色神话》影响甚大,穆尔-吉尔伯特(Moore-Gilbert)认为,所有对于后殖民理论的评估都会从这本书中受益。《白色神话》首次系统深入地讨论了萨义德和后来的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这“神圣三剑客”的思想,并且还追溯到了塞萨尔、法侬等人,奠定了今天后殖民理论的基本结构。

罗伯特·扬本人后殖民批评的特征,来自于他自己的独特位置:第一,后殖民理论虽然是一种西方理论,但后殖民理论家却主要由非西方裔学者构成,如法侬来自中美洲和阿尔及利亚,萨义德来自巴勒斯坦,斯皮瓦克、霍米·巴巴来自印度等等;罗伯特·扬却是一位纯粹的欧洲白人;第二,罗伯特·扬在进入后殖民批评领域之前的学术背景是欧洲高雅理论解构主义;罗伯特·扬的第一部后殖民理论批评的著作《白色神话》出版于1990年,而在1981年他就编辑出版了两部有关解构主义及历史问题的著作,并在此领域为人所知。这种独特背景,决定了罗伯特·扬在进入后殖民批评的时候会采取与其他非西方裔学者相对的观察立场,即会从西方理论的内部——特别是他所擅长的当代解构主义与历史——的角度回应后殖民理论。在他看来,黑格尔、马克思之后的西方历史书写,很难逃出这一“同一与他者的辩证法”魔咒,无怪乎后殖民批评家全面否定和批判西方当代理论的“种族中心”。不过,问题没那么简单,他认为,当代西方理论其实经历了挣脱黑格尔、马克思思维方式的艰难过程,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在这一方面功莫大焉。罗伯特·扬大致将一战后的西方理论区分为德国学派和法国学派,认为两者都是在对于西方历史传统的反思中发展起来的,而后者较前者在历史观念上有更可观的突破。如果说欧洲内部的一次大战导致法兰克福

学派主要在西方的文化脉络上追究法西斯与启蒙理性传统的关系,那么二次大战后的法国后结构主义则因为又经过了殖民战争的失败及殖民地独立革命等历史而具有了更为宽阔的视野,他们思考的中心问题已不仅仅是法西斯主义,而是产生法西斯主义症状的文化机制。罗伯特·扬重点推出的人物是列维纳斯和德里达。他认为,这两位欧洲哲学家在清理西方与他者的关系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同构型的西方传统。他特别推崇德里达,事实上“白色神话”这一术语就来自于德里达。

欧洲内部的德里达何以能够具有非殖民的视角?罗伯特·扬给我们提供了独特的解释。罗伯特·扬在《白色神话》开头有一段著名的话:“如果所谓的后结构主义是某一历史时刻的产生,那么这一时刻可能不是1968年五月革命,而是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无疑它自身既是一种症状也是一种结果。在这个方面,意味深长的是,萨特、阿尔都塞、德里达和利奥塔要么生于阿尔及利亚要么与那场战争有关。”^①也就是说,德里达等后现代思想之所以能够从外部反省西方自身,与他的阿尔及利亚殖民背景有关。罗伯特·扬断言:后现代主义自身不但是晚期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文化效应,更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世界中心位置失落的产物,“根据福柯的说法,在18世纪末,‘人’作为‘经典秩序’的中心位置解体了,让位于‘历史’,那么在20世纪末,当‘历史’让位于‘后现代’,我们目睹了‘西方’的解体”^②。

在后殖民批评家中,罗伯特·扬最推崇的是曾在牛津与他同事的霍米·巴巴。萨义德虽然批判东方主义的二元论,但他自己仅仅在西方的范围内呈现知识生产,因此无意中仍在重复西方/东方的二元论。罗伯特·扬认为,对于萨义德二元论的最大挑战来自于霍米·巴巴。霍米·巴巴试图打破这种主体/客体、自我/他者、本质/现象的辩证关

① Robert Young, “White Mythologies”, *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First published 1990 by Routledge, p. 1.

② Ibid., p. 20.

系,而代之于矛盾、分裂、双向、模棱两可等概念。在罗伯特·扬认为,如果说萨义德的贡献是以福柯的话语理论替代了从前的文化批评,那么霍米·巴巴则以心理分析替代了萨义德的话语分析。罗伯特·扬特别偏爱霍米·巴巴的“杂交性”(Hybridity)这个概念,他将这个术语单独提了出来,进行了历史追溯,并将其从种族理论发展成为文化批评的概念,以之说明 20 世纪文化交汇的状态。罗伯特·扬认为,“杂交性”不同于非此即彼的常规选择的“双重逻辑”,“正可以作为 20 世纪的特征,与 19 世纪的辩证思维相对立”。^① 非但如此,罗伯特·扬还将描绘殖民话语交汇状态的术语“杂交性”进一步发展成了一个动力学和本体性的概念。

霍米·巴巴以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概念,深入分析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确实非常精彩,但罗伯特·扬犹感不足,他觉得这种分析尚是一种静态分析,它可以从微观角度说明殖民话语的复杂状态,却不能从宏观方面说明殖民主义的动因;与此相反的是,马克思等人从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角度说明欧洲殖民主义的起源,这是有说服力的,但看起来过于外在,无法切入到心理欲望的深处。罗伯特·扬觉得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够全面阐释殖民主义,从而彻底超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模式。罗伯特·扬试图借助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概念,建立自己关于殖民主义与欲望机器的理论。他认为,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理论是一个洞见,但问题在于它只说明个人和家庭,却不能顾及社会,德勒兹和瓜塔里察觉这一问题,他们认为俄狄浦斯情节不但是是一种个人压抑,而且经由家庭构成了社会压抑,是“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压制的主要手段”,这一思想给了罗伯特·扬以极大的启示。罗伯特·扬认为,种族主义可以说是最为典型的说明欲望与社会生产的例子,殖民主义也是如此。它不但是一种政治经济军事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欲望的生产。罗伯特·扬借

^① Robert Young,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 First published 1995, p. 27.

助于德勒兹和瓜塔里想表达的意思是,殖民主义不但涉及物质上的领土,而涉及心理上的殖民主体关系,不但涉及经济和工业化,而且涉及文化关系。罗伯特·扬对于西方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发现那里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于“他者”的欲望。比如勃朗特、哈代、劳伦斯、康拉德、乔伊斯等等西方现代经典作家,都无限热衷于描写“身份的不确定的交错和侵入”。关于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萨义德早已发表专著《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加以论述,罗伯特·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吸取了霍米·巴巴的灵感,认为这种殖民欲望不完全是简单的侵略或占领,而是一种“嫁接”和“杂交”。罗伯特·扬指出:“情况常常如此,殖民主义力量,如英国,并不消灭或破坏一种文化,而宁愿试图将殖民主义的超级结构移植过来,以便间接统治的方便,强加一种新的帝国文化模式,将殖民地文化转变成为一种学术分析的对象,从而冻结这种原始本土文化。”^①这种内在的“嫁接”“杂交”的欲望与资本主义物质侵略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殖民主义的机器。

在汉语世界里,罗伯特·扬较为人知的著作并不是《白色神话》,而是他出版于2001年的《后殖民主义:一种历史介绍》,原因很简单,台湾2006年出版了这本书的汉译^②,这是罗伯特·扬著作唯一的汉译本。不过,汉语读者如果把这本书作为后殖民理论的基本介绍,却容易受误导,而《白色神话》反倒可以看作是后殖民理论的入门之作。《后殖民主义:一种历史介绍》一书的重点在于梳理反殖民的历史,并试图建构他的独特的“三大洲主义”(Tricontinentalism)。这部书十分庞杂,它首先梳理了西方内部的反殖实践,考察范围包括从拉斯卡萨斯到边沁,从19世纪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直到今天的萨义德、德里达等人,应该说这一工作带有填补空白的性质,这是萨义德及阿希克洛夫特都没有做到的。与此同时,这本书又花了更多的篇

① Robert Young,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 First published 1995, p. 174.

② 《后殖民主义——历史的导引》,周素凤、陈巨擘译,巨流图书公司2006年版。

幅介绍三大洲殖民反抗的历史。自第八章到第二十五章都在谈论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世界反殖革命,范围包括中国、埃及、万隆会议、拉丁美洲、非洲、爱尔兰、印度等等。与萨义德、阿希克洛夫特等人不同的是,罗伯特·扬对于三大洲反殖实践的介绍主要侧重政治思想实践,而不是文学。他主张将“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改为“三大洲主义”,试图建构一种融合了西方和三大洲反殖实践的知识政治形式。

罗伯特·扬原在牛津大学,现到了纽约大学,任英语与比较文学 Julius Silver 教授。他的《白色神话》等享誉甚高,得到霍米·巴巴等人的高度称赞,颇受西方学界注意。前两年,清华大学也首次邀请他来北京讲学。那一次,我和罗伯特·扬有一次专门的聚谈,收获甚丰。可惜的是,大陆学界至今没有翻译过他的任何著作,希望《白色神话》一书的翻译能够成为大陆学界了解他的窗口。

三

与前两本著作不太相同的是,阿吉兹·阿罕默德的著作《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是一本论文集。其中较为中国学者所知的是《詹姆逊的他者性修辞和“民族寓言”》一文,这篇文章对于 80 年代末在中国广有影响的詹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进行了有力的批评,对中国学者颇有启发。不过,《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一书之所以成为经典却不是因为这篇文章,而是它对于后殖民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对于后殖民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我们熟悉的是阿瑞夫·德里克(Arif Dirlik)。事实上德里克深受阿罕默德的影响,基本袭用了后者的批评框架,但德里克在中国很有名,翻译颇多,阿罕默德却默默无闻。阿罕默德对于萨义德的批评,涉及的方面林林总总,可以说是集各种批评之大全。阿罕默德指出: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声称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但他的理论基础其实是奥尔巴赫的人文主义,这导致他在概括东方主义的时候出现混乱。福柯促使萨义德将东方主义追溯至

18世纪,而奥尔巴赫却促使他将东方主义追溯至古希腊。^①阿罕默德还指出:萨义德无法分清后现代的“表现”与现实主义的“表现”。在差异和身份政治中,萨义德没有诉诸政治经济和物质性,而是诉诸话语。阿罕默德的看法相反,他认为:西方历史上的东方主义偏见,并不是话语的问题,而源之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另外,阿罕默德认为:西方文化传统是异质的,其中不乏对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传统更广为人所知,萨义德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西方多元文化糅合成东方主义,而标榜自己是最后的终结者。^②在知识上,阿罕默德对于萨义德的跨学科能力也表示怀疑。他注意到,《东方学》一书的征引书目多来自萨义德的比较文学和哲学训练,他以此跨越庞大的东方主义显得力不从心。^③

上述诸种批评现在已经被人们熟知,在我看来,能够显示阿罕默德个性的,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左派批评。从革命的视野出发,阿罕默德对当代帝国和殖民问题进行历史追溯,并在当代世界格局的框架里定位后现代以至后殖民的右翼性质,这就给他的批评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宏观高度。

在阿罕默德看来,萨义德的《东方学》出版于1978年并非偶然。1978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二十年非殖民化战争结束的时间。这革命的二十年,以1954年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以1975年西贡解放结束,期间还发生了很多事件,包括中国革命、朝鲜战争等。其中决定性的转折点是1973年智利人民联盟政府的失败,而1978—1979年发生在伊朗和阿富汗的革命使这一转机成为定局,它预示着后面的苏联解体。这期间出现了众多反殖反帝革命的领袖,如纳赛尔、尼赫鲁、恩克鲁玛、苏哈托等。无可置疑的是,这场革命带来了世界秩序的重组:在美国,里根上台;在英国,撒切尔上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被击败;在意

① Aijaz Ahmad, *Orientalism and After*,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 First published by Verso 1992, p. 166.

② Ibid., p. 172.

③ Ibid., p. 173.

大利,共产党退出竞争并瓦解。对殖民革命国家而言,对于帝国主义的抗争愈来愈多地被合作所代替。国际焦点发生了变化,从革命战争转向了资本主义世界内的合作,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新秩序”“七十七国集团”“石油输出组织”等组织形式出现。

在这种形势下,西方激进思想也发生了转折。简言之,马克思主义被摒弃,尼采、福柯、德里达风行,革命斗争被话语实践所代替。这些知识仍以“左”的面目出现,反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关注底层和第三世界,但他们与任何实际的革命运动都保持距离。简言之,这就是我们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潮。阿罕默德从左派的立场出发,对这种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后现代将历史看作文本,将阶级和民族视为本质主义,贬斥物质性历史,如此就否定了历史理解的可能性,只剩下了抽象的个人。在福柯成为风尚的时候,他认为思想只能成为游戏。^①正是在这种西方文化背景下,后殖民理论出现了。在反殖反帝时代,被肯定的是民族自决权,时兴的是文化民族主义。缘于第三世界移民身处西方的特定处境,这种民族主义得到了他们的拥护。西方的大学虽具多元性,但来自第三世界的学生与学者所受到的歧视和压力是无形的,民族主义文化由此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撑,对于民族文化的研究也有利于他们在西方大学的区域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形下,那些不愿回国而留在西方的知识者,便不遗余力地宣传民族文化及“第三世界文学”。不过,这些为数不少的第三世界移民,原来在本国都处于上层,在西方则成为资产阶级技术管理阶层和大学教师。他们拥护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却并不拥护真正反帝反殖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着眼于阶级立场,为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和西方国家的贫困阶级呼吁,这些都不是他们的关注之所在。这些移民者的目的,是在西方谋取优厚的位置,并不为他的祖国考虑,也不打算加入西方的无产阶级阵营。后现代思潮在西方的风行,让这些移民知识者有了知音之感。

^① Aijaz Ahmad, Literary Theory and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 First published by Verso 1992, pp. 70-71.